

《钟形罩》中的医学与冷战政治

蒋天平,李赛星^①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长期以来学者都从疯癫、女性主义等角度分析美国女诗人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中的女性榜样缺失、父权文化、理性疯癫等。文章从精神病学、女性主义医学等角度分析作品,认为小说不仅关注女性的个人生活,更揭示了当时女性背后的冷战政治,以及作者对帝国冷战政治的担忧。的确,西尔维娅·普拉斯是一位真正的文化大师。

[关键词] 精神病; 女性医学; 冷战政治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5-0119-06

医学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促使社会进化的重要动力,展现了理性和工具。西方医学又称西医,是西方知识建构与发展传统中的重要资产。历史学家张伯伦认为:“医疗如同战场,是政治的延伸。”^[1]现代西方医学制度不仅代表着医学的重大进步,更代表着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技术不断提高,强化,开启了现代政治制度。安德森认为,“西方医学话语对普世主义与现代性的宣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涵盖了帝国的欲图”^[2]。因此西方医学成为帝国政治的工具。

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冷战日益加剧,柏林墙修建、两大军事集团建立等事件都引发双方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相继开展一系列大气层氢弹试验。政府的冷战政策引发各国民众强烈抗议。20世纪60年代英国民众,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大肆批判美国冷战政策,掀起了两场针对美国政府核军备竞赛的政治运动。1950年普拉斯进入英国史密斯学院学习,195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期间普拉斯主修过各类政治学课程,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频繁接触政治。拿破仑帝国、一战、二战、冷战等历史都引起她的强烈关注。她深刻感受到国际政治气氛对核军备竞赛的态度,开始质疑、反对美国的政策。在给母亲的信中,普拉斯多次谈到了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担心大气层中的氢弹试验会影响孩子们的未来。1961年2月普拉斯的流产事件更坚定了她对美国政府的批判态度,美国就是一个十足的无赖

国家^{[3]73}。

普拉斯1961年创作的《钟形罩》^[4]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被评论界视为一部政治的、精神异化的经典小说。《钟形罩》比其他精神病小说,如《我未许诺过你的玫瑰花园》《水中的脸》等作品都更多地关注了女主人公的精神疾病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联系。库姆卢指出普拉斯借用埃斯特批判了美国政治、文化和冷战意识形态^[5]。虽然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文学与政治分离,但普拉斯在《钟形罩》中借用反精神病学运动、女性主义医学、健康医学对帝国和父权进行了深刻批判。的确,普拉斯作品具有强烈的反美国、反军事、反父权的意识,然而现代主义叙事也成功地掩盖了作品对冷战的担忧^{[3]46-58}。

一 歇斯底里症与卢森堡事件

19世纪中期精神病学产生于欧洲,20世纪初重心转移到美国。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开始进入美国精神病学,并占领了美国精神病学30多年,“精神分析对美国的精神病学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6]211}。反精神病学始于19世纪,20世纪60年代美国盛行否定、批判权威的的社会风气,以及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的出版,都推动了反精神病学在美国的发展^{[6]364}。反精神病学认为,精神病本质上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是政府的大阴谋,政治斗争的工具,用于打击和迫害各类异见者。精神病院充满邪恶,精神病医

[收稿日期] 2017-12-26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语文学中的殖民医学研究”资助(编号:17YBA343);南华大学社科预研项目“医学惊悚小说家罗宾·科克研究”资助(编号:2015XGY07)

[作者简介] 蒋天平(1972-),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①衡阳技师学院教师。

生都是彻底的无耻之徒。反精神病运动的目的是要号召社会批判、解构那些不喜欢约束,但异常天赋的人被“疯癫”的现象^{[6]363}。60年代《飞越疯人院》《钟形罩》等作品都呈现了反精神病运动所关注的问题,成为反对精神病学的宝典^[7]。

歇斯底里症是一种以情绪上的兴奋和身心感知障碍为特征的神经官能症,常伴有不可控的空间或情绪过度。它产生于19世纪,植根于当时社会、政治和历史条件中。现代社会的男性医学话语认为,缺乏正常的性活动,以及没有生育子女等缘故会导致女性的歇斯底里症。因此女性只有遵从社会期望,忠于家庭、安守本分才能免于歇斯底里症的侵扰。根据定义,小说人物埃斯特患上的是歇斯底里症。在内心深处,普拉斯和埃斯特都主张女人性,对男性和正常、和睦的家庭充满期盼,渴望男性的亲近,“我是一个女孩。我对男人和他们的生活怀有极大的兴趣,这经常使我产生引诱他们的欲望或者与他们亲近的念头”^[8],期望嫁给一个“强壮的、温柔的汽车修理工”,生养一大群孩子和畜养一大群动物。她厌恶那些像帕西特和古怪的具有同性恋倾向的老女人,抱怨“为什么我总是吸引这些古怪的老女人呢?”^{[4]138}尽管她内心对男性、婚姻渴望,并先后与巴迪、莱尼、康斯坦丁、马科、欧文等五位男性有过接触,但都遭遇失败,尤其是与多琳一同外出约会的事件给她带来极大的“侮辱”。随后遭遇马科袭击,申请哈佛法学院的写作班失败等一系列事件让埃斯特的歇斯底里症大暴发,开始反叛女性角色、母亲角色、婚姻。

斯皮瓦克认为父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是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双重霸权的结合^[9]。二战结束后,为了安置大批从战场归来的男性士兵,同时为了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鼓励女性生育,号召妇女回归家庭做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保护家庭免受共产主义思想侵袭的威胁。女性成为美国社会稳固、免受敌对意识形态侵袭的基石。冷战期间共产主义间谍是最可怕、最不能被接受的身份。1950年卢森堡夫妇被指控叛国罪,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罪犯”,三年后被送上电椅。审判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胡佛一直指控朱丽叶斯·卢森堡不守妇道,没有尽人妻、人母的职责,教唆软弱的丈夫反对政府,投身于敌对势力,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散,给世界造成惨重损失^[10]。卢森堡事件激发了社会对女性社会规范的深刻反思,那些不守妇道、不安于家庭职责的妇女都是精神病人。婚姻关系和家庭主妇角色成为辨别女性精神疾病的标准。卢森堡事件凸显了当时政治化背景和女性承受的双重压

力——帝国政治和父权文化。受此影响,普拉斯在小说一开始就提到国内压抑、沉闷的政治气氛,“时装杂志的圈子越来越显出其肤浅造作,回想则意味着回到波士顿郊区那死气沉沉的夏日世界,这两者都给她带来极大压力”^{[4]38}。小说也有意把主人公埃斯特命名为埃斯特·格林拉斯·卢森堡(Esther Greenglass Rosenberg)。后来在出版社的要求下,为缓解作品的意识形态对时局的针对性过强,作者不得不将埃斯特·格林拉斯·卢森堡改为埃斯特·格林伍德(Esther Greenwood)。

当时的冷战社会,女性不仅需要符合母亲、主妇的社会身份,还必须顺从、温柔、穿着得体、清洁卫生,“女性的装束和衣服的细节成为衡量女性心理是否健康的标准”^{[11]212}。埃斯特对女性服装规范并不热心,多次后悔自己在纽约购买了那么多不舒服、昂贵的衣服,不喜欢穿着时尚、俏丽的服装逛街、购物。在遇到康斯坦丁的苏联女同事时,她羡慕、期望她们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人生深感悔恨,“平生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废物。问题是,还没有自知之明”^{[4]63}。在现实生活中,普拉斯有时认为自己的个性更趋向男性而不是女性。在遭遇马科袭击后,埃斯特对女性身份产生了更深刻的仇恨,站在纽约亚马逊酒店的楼顶,报复性地将自己所有的服装一件一件地抛洒、丢弃。被抛弃的衣物象征着被抛弃的女性身体、身份和社会规范。随后埃斯特在诊所见到了戈登大夫,当时她已有三周没有洗澡,没有更换衣服,整个人都发出一种酸溜溜的气味,这为戈登大夫给她贴上精神病标签提供了依据。

追求女性和事业成为普拉斯和埃斯特共同无法解决的矛盾,诗人、贤妻、良母这三重身份对她们两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桑德拉·吉尔伯特认为女人只有在摧毁自己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摆脱女性角色^[12]。琼成为一个纯洁埃斯特的化身,“琼是过去我光彩夺目、精华部分的翻版,专门用来尾随我,折磨我”^{[4]175}。琼的死亡意味着作者过去贞洁生活的结束、反抗父权的失败,预设了普拉斯的结局。

二 精神病院与电椅事件

斯皮瓦克认为,无论诊所、精神病院、大学还是监狱,都掩盖着更大的帝国主义叙事^[13]。精神病医院是实现帝国政治目的、权力和社会改革的试验基地,是帝国的缩影。故事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精神病院,如巴迪就读的医学院、肺结核疗养院、精神病私人诊所、私立医院、市立医院等,环环相扣形成程序严密的权力网络。医院不仅是个医疗机构、行政机构,还是半个司法机构,因为它处于警察和法院之

间,是平行于法院的第三种压迫秩序。整个社会与精神病院在权力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缩影。医患之间在权力、权威和知识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14]138}。帝国文化赋予了医生对病人凝视和审视分析的权力。病人们如陈列在医院实验室玻璃瓶里的死胎,被医生凝视、分析和解剖。埃斯特、琼等被医生或实习生们如同动物园新来的动物般围观、审视、盘问,以致琼在医院被凝视时抗议道,“这不公平”^{[4]152}。反精神病学认为,精神病院或者收容所是一个使患者幼稚化的封闭体系^{[6]364},阴暗、压抑、单调、没有生气,类似于阴冷封闭的监狱。吉尼亚夫人的私立医院设在地下的电疗室,神秘复杂,地道、地沟交错纵横。

小说名 *The Bell Jar* 中 *bel* 在 19 世纪美国文化中指舞会中最美的、被无数人追求的女人^[15], *Jar* 是透明的、试验用或家用盛放腌制食品的器皿等。一方面 *Bell Jar* 被隐喻为禁闭女性的瓶子,隐射令人窒息压抑的美国父权社会。吉尼亚私人医院中如钟形罩般大小贝尔沙兹楼 (*Belsize*)、无门窗的戈登大夫诊所等都隐射美国公民狭小、窒息,缺乏自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1961 年底苏联和美国相继在大气层测试原子弹,普拉斯因此多次谈到孩子们的牛奶和核灾难、核测试,*Bell Jar* 隐喻了美苏两国大气层的核实验造成空气的窒息,就像被浸泡在实验瓶里的标本,孩子缺乏自由生存的空间。

精神医院控制病人并根据健康程度、治疗计划进行分类。吉尼亚私人医院包括韦马克楼 (*Wymark*)、开普兰楼 (*Caplan*)、贝尔沙兹楼 (*Belsize*) 都有其喻意,作为缩略形式的叙事,命名折射出一种文化价值观和认识论。病情严重需长期治疗的住韦马克楼 (*Wymark*), *mark* 是标识、标签、做记号的意思,意指精神病人标签;病情改善后并愿意服从医院安排的住在开普兰楼 (*Caplan*), *plan* 是计划的意思,暗指病人将按计划接受电休克疗法、脑白质切除手术等,“在开普兰,许多女人接受休克疗法”^{[4]176}。最后病人逐渐康复住进贝尔沙兹楼 (*Belsize*),隐喻微型的美国社会。

某种意义上现代医学都是一种对身体的垄断和殖民^[16]。二战后,美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推动医学科技的迅速提高,医院里使用各种高新技术殖民身体,譬如避孕手术、子宫帽、电疗、脑白叶切除手术、分娩、休克疗法等。这些新型现代医疗技术强化了作品的控制主题。60 年代电疗法是冷战时期精神病学最突出的特征,又称电休克疗法 (*ECT*)。它以定量电流通过患者头部,产生暂时性休克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埃斯特先后接受了戈登和诺兰两位大

夫的电疗。在戈登大夫诊所埃斯特感觉“世界末日”一般,接受诺兰大夫电疗后,情况好转,如重获新生。休克疗法的目的是使病人情绪回归正常,循规蹈矩、安于现状,丧失反抗精神,“使人安静、遵守秩序、不捣乱”,成为当时治疗躁狂抑郁症和重症抑郁症的首选。但反精神病运动认为电刑是 20 世纪中期帝国为排除异己、消除反抗、打压敌对势力的一种惩罚手段。肖瓦尔特研究十九和二十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作品后发现,电击、化疗等方式是对具有反抗意识女性的象征性惩罚^{[11]210},类似于家庭暴力,“有些丈夫殴打妻子,或者将他们的不满意付诸医疗,让医生为他们服务”^[17]。电刑和电椅在英语中都是单词 *Power*,说明两者具有同样的控制效用。因此作者被认为是一位关注冷战政治的文化批判大师。在一次采访中,她就声明自己热切关注当前政治^[18]。小说开篇也谈及了卢森堡电椅事件,“我老是禁不住去琢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4]1}。

三 女性主义医学

以还原论或机械论为基础的近代科学被女性主义者们认为是西方的、男性的、父权的阴谋,“女性整个生命过程中毛病不断,需要医生关心,男性医生成为健康问题的权威。以男性为主导的现代医学将人类问题的解决纳入狭窄的生物学或技术的范围。”^[1]科学和医学话语一直在强化父权价值和当代社会体制。在医学话语中,女性总是被定义为他者,是病态和不完整的男性;软弱、不稳定、不洁,性病的携带者。因此父权打着关心女性的名义异化女性、控制女性的身体,尤其是产科学和妇科学。

分娩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进行控制、规训的重要内容。20 世纪以来女性分娩多从家中渐渐转向医院,到 1955 年美国大约 95% 的婴儿都在医院出生。因此科技的进步是对妇女身体和权力的侵犯^[1],一方面是科学、理性的产科学逐渐取代人文关怀的助产士,另一方面是男性医生取代女性助产士。埃斯特描述了医院里女性分娩的过程及一系列的器械:刑台般的产床、各类陌生的仪器、线缆、瓶管、阴道镜等仪器。在医学话语中,阴道镜常被隐喻为强奸,因为插入会给身体带来不适、会亵渎个体的道德贞操和纯洁。

女性在分娩过程中被动的、一动不动的、柔顺的、屈从的,满足了强烈的男性欲望。医生会“像剪布料似的”剪开病人的皮肤,孕妇“好像长了个硕大无朋的蜘蛛肚子和两条被脚蹬高高架起的细长而丑陋的腿”^{[4]54}。产房里接生的都是男性三年级医科生,很幼稚。现代医学披上科学的外衣,实施对人的内在控制,麻痹人的意识,驯化女性臣民。在医院埃

斯特看到了分娩过程中使用的“忘却痛苦的药”。药物出自男性之手,带着父权的痕迹,1914 年被推广至全国范围,欺骗女性不停地为男性服务。由于此渡渡能够愉快地准备第七次分娩。现实生活中普拉斯也怀上第二个孩子,为此作者在创作中对这种药物进行了批判。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避孕术获得飞速发展,出现了口服避孕药、胰岛素、麻醉药、宫内节育器、子宫帽等避孕技术,更重要的是冲击社会的避孕观念。父权话语中避孕是一种犯罪,“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是非法的——至少在马萨诸塞州是吧”^{[4]189}。埃斯特拒绝母亲身份,上子宫帽时心想“我正在爬向自由呢”^{[4]191}。子宫帽是各种避孕术中一种有效的反抗父权、摆脱母性身份的武器,帮助埃斯特建立“身体与其主体不可分离的关系”^[19]。

现代科技理性将女性所有自然、正常的生理问题都医学化,被解释为需要治疗的疾病,医学对女性的关注变成对女性的监控。埃斯特在第一次性爱中意外遭遇了一次大流血,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男性医生用手侵入埃斯特体内,并以轻佻的口哨声和哈哈大笑回应,“在 19 世纪,如同穿越非洲大陆的殖民者一样,医生们成为探索女性身体幽密的探险者”^{[14]197},体现了社会控制、性别与性态控制的深层男性欲望。

自古以来,社会观念中男性无论在智力上、体力上都优越于女性。女性身体柔顺、屈从,易遭受男性控制、摧残。小说中多琳的身体就被莱尼用酒精灌醉、杂志社实习生被尸毒毒倒,埃斯特被马科暴力侵害、滑雪时摔断四肢、被欧文侵害出血等都能证明男性对女性的侵害。残疾的身体满足了父权的征服欲望和胜利感。巴迪表面上担心自己造成了埃斯特和琼遭遇,但实质上被视为父权神话的佐证,以满足男性虚荣,但遭到埃斯特的嘲弄,“你跟我们的事毫无关系,巴迪”^{[4]206},从而否定了父权控制女性身体的神话。

同性恋指只对同性群体产生爱情和性欲的个体,关涉到人类学、精神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它最初被诊断为精神疾病或者心理、生理疾病,20 世纪中期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结果。60 年代,社会掀起恐同症高峰。弗洛朗斯·塔玛涅指出同性恋革命性的本质,它质疑、挑战传统家庭、权威、父权^[20]。小说中女同性恋琼从同性身上去寻找温暖和关爱,喜欢威尔德夫人、奎恩大夫和埃斯特等人。

四 健康与核污染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医学总受到医

学模式的影响,之间经历了四种形态的更替,巫医医学模式、整体观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心理上的不正常以及社会适应上的不良都被视为疾病。这一模式中,健康成为医学的重要内容。健康是多位的,包括躯体的、精神的、心里的、社会的以及道德的。健康成为医学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是个政治问题”^[21]。健康问题中的环境因素起到重要作用,例如饮食、生态和社会氛围。

20 世纪 50 年代美苏英核军备竞赛已经到了大气层核试验上。大气层核试验给全球环境带来巨大危害,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烟云容易随风扩散到全球,反射性尘粒沉降到地面对所有生物造成反射性的损伤。1957 年通过了核禁试的协议。1961 年两国又重启了核军备竞赛活动。普拉斯在史密斯学院学习期间接触了国际政治,虽然质疑“美国生活的法西斯化”的提法,但看清了美国对世界霸权和反民主政策的战略计划,让她重新思考美国的民主,明白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称霸世界的实质。尤其是对美国的战略家们公开表示美国正在准备细菌武器时,表示强烈的抗议,认为英美反对联合国关于禁止将原子弹作为战争目的使用的决议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普拉斯和埃斯特出于对小孩健康的顾虑而拒绝母亲身份,对当时的父权政治提出抗议。小说创作期间,普拉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此后经过一次流产,受此影响一直担心美苏之间的大气层核试验引发的放射性物质会污染孩子们的食品链,因此一直排斥母亲身份。在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希望在牛奶中的锶 90(铀的裂变产物之一)的水平不会太高。我对原子弹太沮丧了;美国应该对全世界的原子武器负责”^[22]。邻居渡渡的孩子们食品问题时常引发她的担忧,“一加仑一加仑的胡兹牌牛奶喂养她的六个孩子”^{[4]99}。

由于担忧军备竞赛对孩子的影响,普拉斯多次借用孩子的脸讽喻、批判帝国政治。在巴迪医院里的杂志图片中,“艾森豪威尔的脸冲着我,满脸堆笑,没有毛发,没有表情,恰如一张药水瓶里的胎儿的脸”^{[4]73},医院里埃斯特又一次看到艾森豪威尔和孩子的脸,“一张张胖墩墩的充满活力的婴儿脸……脸长得像艾森豪威尔的婴儿……一步步迈向一个充满焦虑、令人不安的世界”^{[4]190}。话语一方面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和孩子是作者的关注焦点,另一方面揭示了在控制欲方面总统和孩子之间的相似之处,男性气质促成总统的行为像孩子一样喜欢恃强凌弱^{[3]71}。

自儿童时代起普拉斯就接触到共产主义。在史密斯学院的日记中记录了她参加的多次共产主义的讲座,关于剥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亚洲的民族主义以及“亚洲的共产主义人物”等。作者对来自苏联人及苏联体制很是欣赏。来自苏联的康斯坦丁和他的女同事被肯定性地描述,“他有模有样,浅棕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神情活泼而又迷人。……他有一种我所认识的美国男人没有的东西,就是直觉”^{[4]61}“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4]68},与他在一起感觉到纯粹幸福感,“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意识到纯粹的幸福只存在我九岁以前”^{[4]61}。女翻译用于如此。事后埃斯特幻觉出来的无花果隐喻她人生选择上的迷惑,得到康斯坦丁和女同事的指引,她决定引诱康斯坦丁。与巴迪完全相反,作者对康斯坦丁等人的塑造揭示出她本人对陌生化他者的欣赏和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批判。

在男权社会环境的氛围中,女人成为母亲后容易蜕变为父权社会的代言人,热衷于传播男权思想,就像埃斯特和巴迪的母亲一样,“家庭的主要贡献是使年轻一代熟悉和接受父权制思想体系中的有关角色、气质和地位的固有态度”^[23]、“男人是射向未来之箭,女人是箭的出发点”^{[4]59}。因此她憎恨所有女性,甚至扔掉了母亲送给她的生日玫瑰。

五 精神分析师和父权帝国代言人

20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美国精神分析黄金时期。精神分析深入到大多数的私人诊所,85%的精神分析师都在诊所里执业^[24]。福柯描述精神分析在美国的盛况,“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收容所和救济院,政府官员就是‘心理学家’,而人民就是‘病人’”^[25]。为了支持和配合国家军队的需要,精神分析师常常被政府聘为政府官员,享受优厚待遇,影响力逐渐扩大,其职业成为“美国中产阶级上层的至高理想”^{[6]239}。在这个行业里性别差异明显,当时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中91%的精神分析师都是男性,而女性成为病人。爱德华·肖特认为男性精神病医师披着科学、客观的外衣推行传统的父权观念和厌女思想,将父权力量扩大到妇女身上^{[6]363}。精神分析师是父权帝国的代表。在反精神病学运动中,男性精神分析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切瑞·沃克指出小说中男性角色从未把女性当作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类看待^[26]。作者描述他们虚伪、贪婪、奢靡,是金钱的“掠夺者”^{[6]364}，“星期日——医生们的天堂！……各处的医生们都在尽情享受凡人之乐,将医生的职责抛开一边”^{[4]199}。戈登大夫和巴迪是典型代表。戈登收费标准高得惊人,第一次见面远非埃斯特想象的慈爱、丑陋、有直觉。他还展示

自己的照片,让埃斯特愤怒,“不知怎的,这张照片让我大为光火”^{[4]110}。不仅因为治疗无效,更因为治疗是种羞辱,剥夺她关于健康、财富、知识和权力话语,“你认为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呢?”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贴标签行为。埃斯特对戈登大夫进行报复,有意将照片中戈登的妻子误认为他的妹妹,“没准是戈登大夫的妹妹呢!”^{[4]109}羞辱、控诉他乱伦;有意混淆照片中狗的花纹和妻子身上的裙子,“可能不过是那女人裙子上的图案而已”^[27]。

罗宾·皮尔认为巴迪的虚伪和欺骗的本性和冷战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3]67}。在纽约,埃斯特发现男性掠夺成性,有暴力倾向,制造出全球化的政治问题,如“核军备竞赛是由男性操纵的结果”^{[3]70}。巴迪貌似健康、英俊、聪明、和善,但也为女性设计出两重圈套:双重道德标准来欺骗女性。他先后与酒店女招待鬼混,与琼·埃斯特恋爱,却要求埃斯特保持贞洁。巴迪形象影射作者的丈夫休斯。他曾在普拉斯怀孕、哺乳期间出轨,后两人分道扬镳。作者的多部传记描述休斯为父权社会的代表,普拉斯为父权社会的牺牲者。费·韦德森称休斯为“一个没有名字的男人,可以是任何人。所有男人都是同一个名字”^[28]。艾玛·特南特认为普拉斯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休斯的大男子主义及对婚姻的背叛^[29]。第二个圈套指男性制造避孕药欺骗女性生育。埃斯特在医院见证了母亲分娩被欺骗的过程,麻药是女性第二次受骗。二战后美国政府宣扬传统母亲光荣鼓励生育。战后20年间美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婴儿潮”,大约有7600万个婴儿出生。邻居渡渡有了6个孩子并幸福地计划第7个孩子。渡渡(Dodo)在英文中是指古代一种不会飞翔的笨重的大鸟,以此讽喻怀孕的渡渡为永远生蛋的大鸟,“其一生的使命就是为帝国繁衍更多的后代”^[30]。

六 结 论

20世纪中期美国施行帝国统治,对外利用武力扩充国际空间,对国内强化统治、排除异己,推行大美国主义,将女性的反抗“医学化”。普拉斯借助精神病、女性身体医学等经历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社会政治环境和普遍存在的焦虑,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独裁、专制、权威的权力帝国形象,陈述了对帝国政治的担忧和愤怒。美国学者佩洛夫认为:“埃斯特的精神分裂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普拉斯关注的不是精神疾病自身,而是埃斯特个人的精神问题与大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物的困境就是努力成为符合社会秩序的女人,但她既无法接受,又难以抛弃这些男性设定的女性规范。”^[31]

[参考文献]

- [1] 刘兵.女性主义对现代医学的政治批判二题[J].医学与哲学,2001(8):23-24.
- [2] ANDERSON WARWICK.Where Is the Postcolonial History of Medicine[J].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1998,72(3):529.
- [3] PEEL ROBIN.Writing Back:Sylvia Plath and Cold War Politics[M].Madison Teanek: Fairl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2.
- [4] [美]西尔维亚·普拉斯.钟形罩[M].杨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 [5] KUMLU ESIN.Not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but the Cultural Critique: Understanding the Organic Writing of Sylvia Plath Through "the Bell Jar"[J].A taturk Universities Social Bilimler Enstitusu Dergisi,2010,14(2).
- [6] [美]爱德华·肖特.精神病学史——从收容院到百忧解[M].韩建平,胡颖羽,李亚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 [7] FARLAND MARIA.Sylvia Plath's anti-Psychiatry[J].Minnesota Review,55-7,2002:245-246.
- [8] PLATH SYLVIA.The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2:55.
- [9]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M].London:Routledge,1988:90.
- [10] DWIGHT S EISENHOWER.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the White House years[M].London:Heinemann,1963.
- [11] SHOWALTER ELAINE.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1830-1980[M].London and New York:Penguin,1985.
- [12] GILBERT SANDRA,SUSAN GUBAR.No Man's Land: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3:Letters from the Front[M].New Haven 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298-302.
- [13]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279.
- [14] [美]卢普顿.医学的文化研究:疾病与身体[M].苏静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
- [15] MARTIN LINDA WAGNER.The Bell Jar:A Novel of the Fifties[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2:22.
- [16] ARNOLD DAVID.Colonizing the Body: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9.
- [17] BOZARTH,OLLIE MAE.' Shock:The Gentlemen's Way to Beat up a Woman' [M].Madness Network News, Lune 1976:27.
- [18] ORR PETER."Sylvia Plath" in The Poet Speaks[M]. London: Rougledge and Kegan Paul,1967:169.
- [19] MERLEAU PONTY MAURICE.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London:Routledge,2002:232.
- [20] [法]弗洛朗斯·塔玛涅.欧洲同性恋史[M].周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333.
- [21] 陈晓阳,王云岭,曹永福.人文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66.
- [22] PLATH SYLVIA.Letters Home: Correspondence 1950-1963[M].London:Faber,1975:434.
- [23] [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3.
- [24] CHESLER PHYLLIS.Women and Madness[M].New York: Doubleday,1972:62.
- [25] 高宣扬.论福柯对国家理性的批判[J].求是学刊,2007(6):67-74.
- [26] WALKER CHERRY.Reviewed Work(s): "Sylvia Plath: Method and Madness by Edward Butscher"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77,Autumn,Vol.18,No.4.
- [27] FRETTER LUKE.Sylvia Plath's Fiction:A Critical Study [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 134-135.
- [28] WELDON FAY.Down Among the Women[M].Harmondsworth:Penguin,1971:145.
- [29] ANNIKA J HAGSTROM.Stasis in Darkness: Sylvia Plath as a Fictive Character[J].English Studies,2009,90(1):40.
- [30] COYLE SUSAN.Images of Madness and Retrieval:An Exploration of Metaphor in"The Bell Jar"[J].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1984,12(2):166.
- [31] M PERLOFF."A Ritual for Being Born Twice": Sylvia Plath's "The Bell Jar"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2,13(4):507-522.

Medicine and Cold War Politics in Bar Jar

JIANG Tian-ping, LI Sai-x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analyze themes like the lack of female role models,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rational madness, etc. in *The Bell Jar*, which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written by American female poet Sylvia Plath, with the points of madness and femini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iatry and female medicine,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uthor reveals the cold war politics behind female descriptions and her concerns on the empire politics, apart from personal lives of women. Indeed, Sylvia Plath is a true cultural master.

Key words: psychosis; female medicine; cold war politics